

東亞儒佛會通與諍辯的幾個面向⁺

張崑將^{*}



2012 年 3 月 23、24 日兩天由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國家發展研究所協辦，假臺灣大學第一會議室（農化新館五樓）舉行「東亞儒佛會通與諍辯」之國際學術會議，邀請臺灣、中國、日本、韓國及越南等二十名學者發表論文，會議總參加人數近八十人。本次會議計分八場，包括「中國儒佛會通與諍辯」、「高麗末期朝鮮初期儒佛論爭」、「近現代東亞儒佛會通、諍辯與當代實踐」、「日本儒佛之會通與諍辯」、「韓國儒佛之會通與諍辯」、「東亞儒佛會通與諍辯」、「陽明學與禪學」及最後一場「綜合座談」。

本次會議在籌備之初，即擬出如下之開會旨趣：儒釋道三教在近代以前即具有東亞的共同現象，曾經深深影響東亞的中國、韓國、日

本、越南與臺灣等區域，至今仍然。特別是佛教與儒教兩股風潮，在歷史上更與政權相結合，故不只在民間乃至政治上成為鮮明的主流文化。韓國在六世紀的新羅時代一直到十四世紀末的高麗時代，是個佛教文化主導千年以上的國家，此後的李氏朝鮮時代（1392-1910），則是以儒教文化為國教的王朝。日本自七世紀聖德太子時代到十七世紀的五山禪學文化，佛教文化主導日本亦有千年之久，德川時代（1603-1868）開國以後推尊儒學，儒學方可與佛教文化鼎立而足。越南在丁朝（968-980）獨立以前，雖受中原儒教的薰陶，但基本上在李朝時代（1009-1225）仍然是佛教為主流的文化，諸君主大皆信佛，且有三教流行的特色，至十三世紀陳朝時代因推動儒教才使佛教有式微的情形。儒、佛兩股風潮在上述東

⁺ 本文係 2012 年 3 月 23-24 日由本院主辦、本校國發所協辦「2012 東亞儒佛會通與諍辯」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活動紀要。

^{*}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亞區域形成主流趨勢，歷代知識分子或宗教信仰者在學問成熟或定型之前，必然要遊走於二者的理想世界，例如歷代大儒也須接受佛教的洗禮或刺激，從而開展出其深度之體系理論（如中國的朱熹、王陽明，日本的伊藤仁齋）；故出佛入儒者有之（如德川初期的藤原惺窩、林羅山），出儒入佛者亦不少（如日本空海、明代李贄、袁了凡）。要言之，東亞知識分子或以「儒佛會通」而彼此相印，或以「儒佛諍辯」而互相切磋，留下了大量的文獻史料，值得作一清理的回顧與反省。故這次研討會希冀從東亞的跨文化視野，扣緊儒佛文化彼此「會通」或「諍辯」的交互激盪現象，既欲窺其「會通求同」的理論，也想探究其「諍辯求異」的關鍵點，並從「同」、「異」中覓出可行性的對話與交流之方法論。

本次會議開幕之際，黃俊傑院長即揭示本會乃非以國族為中心論述為核心，係從跨文化、跨領域的角度以及東亞的比較視野作為研究的目標，窺探東亞文化交流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係。因此，儒佛之間長期以來即有「共」與「不共」之處，如在生死觀、輪迴觀等方面有其「不共」處，但在心靈覺醒、重視人文精神上，則儒佛又有其「共」處。儒學與佛教代表著東方的兩大精神文明，至今依然存有許多信仰者或實踐者，故探討兩大精神文明的「共」與「不共」之交流與對話，實有其必要，並具有相當的現代意義。

儒學與佛學是東亞世界的兩大精神文明，於今確實有必要做一統理的工作，但要通達其中一領域已是不容易，何況是儒佛兩個領域兼通者，更屬難事，加上又要跨國族，故既要跨空間的區域，又要跨學術領域，更是難上加難，所以應邀學者在發表之際，都謙遜提到自己均非專家。不過，我們這個會就是希望參與者先「解構自己是專家」的思維，嘗試謙虛地「跨」過去那個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去

「學習」、去「對話」，久而久之，「不熟」也會變成「熟」，因為透過對話不是「一個人」、「一個領域」而是「多個人」、「多個領域」，形成一個綿密的跨領域之網的團隊，能從東亞的視野來比較兩大精神文明，超越國族中心論，以跨文化、跨領域的比較視野為研究目標，期望漸能開發東亞儒佛兩大精神文明交流的新意義與新課題。

因此，基於上述跨領域、跨文化又具有東亞視野的研究目標，本次會議共發表二十篇論文，大多數論文雖都有儒佛會通或諍辯，但也許範圍太大、太廣，難免造成聚焦不夠的不足之處，但會議中激起的學術討論，因有來自不同國家學者的觀點，也刺激學者們多少「跨」些出去，例如金培懿教授〈由不空三藏與《表制集》論代宗朝之儒佛論衡〉一文，在討論過程中，學者就提到可再對唐代的不空金剛之研究，繼續延伸處理到東亞密教的共同課題之比較研究。再如邢麗菊、鄭培謨兩位教授分別發表〈麗末鮮初的社會轉型與儒佛交替〉、〈麗末鮮初知識分子的儒佛論爭考——以鄭道傳的《佛氏雜辨》為中心〉，聚焦處理高麗末期及朝鮮初期鄭道傳、鄭夢周的排佛論，學者建議可考慮跨到先前的中國元代與明代鼎格之際及明代初期的思想史背景，有助於釐清這段麗末鮮初由佛轉儒的關鍵期。再如陳繼東教授發表〈明治儒佛論——以小栗栖香頂為中心〉，也有學者建議在處理明治時期的儒佛論時，可多放大視野來看日本在近代東亞推廣儒佛交流的各種諍辯。又何燕生教授發表〈12-13 世紀東亞禪宗與儒教——以道元關於三教一致說批判為問題的考察〉一文，可與蔡振豐教授發表的〈明末曹洞宗系三教論的考察：以覺浪道盛為中心〉合觀，擴大視野看到曹洞宗在東亞中日三教論之共同課題。至於馬淵昌也教授所發表〈「一生成佛」與中國傳統思想〉一文，有關「一生成佛」的觀念，是否只在中國流行？也

許朝鮮佛教、越南佛教也有同樣的共同課題，而因其特異的風土性而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另莊兵教授發表有關聖德太子〈《三經義疏》倫理思想探索〉，學者也建議聖德太子很具關鍵的「和」之思想，是儒佛共通且是現代東亞國家溝通的主流思想，如何在東亞國家呈現「和而不同」的文化比較，足堪關注。再者，田世民教授發表〈從近世日本知識人的禮儀實踐看儒佛會通與諍辯〉一文，則提出近世日本喪禮中具有儒佛會通與諍辯的神主、牌位的爭議，提出作為祭祀對象的「媒體」方法論，所謂「媒體」意旨在世者與祖先通過祭祀的行為來進行溝通交流的媒介，頗有其新意，這樣的「媒體」方法論，也可以應用到臺灣、朝鮮各區域的祭祀研究。至於林鳴宇教授所發表的主題「東亞儒書、佛書之交涉史」，此次雖多扣緊中日儒佛書之交流，但學者也建議未來亦可朝韓日書籍交流、中韓書籍交流之方向發展，融通中日韓的書籍交流史。而林維杰教授所發表〈越儒黎貴惇思想中的朱子學與仙佛交涉〉一文，則從理氣觀點看越南文化中仙佛交涉之特色，如眾所周知，理氣的問題是東亞共同的學術課題，林維杰發現越儒黎貴惇將佛與鬼神同視，視佛為氣化型態，而充分與神仙合流，此種觀察與阮玉詩教授所發表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越南南部地區儒佛道三教的重新組合〉一文所提到越南人南部社會大量出現新型宗教，幾乎都有氣化的儒佛會通之型態，若合符節。越南這種儒佛鮮明的融合型態，是東亞傳統上即已流行的儒釋道三教融合類型，故崔英成教授發表的〈韓儒孤雲崔致遠之三教會通論〉一文，則提到崔致遠的三教論及近代崔濟愚的「東學」，均具有三教融合色彩，將來亦可延伸與日本德川時代具有三教色彩的梅岩心學及中國晚明三一教主的林兆恩做一研究比較。又此次江燦騰教授發表的〈昭和初期臺灣儒釋知識社群的詮釋衝突〉一文，藉著臺灣

儒釋知識社群的衝突（臺中佛教會館的「中教事件」），在作者層層抽絲剝繭之下，不僅在時間上回溯到明清以來的儒家排佛論，在空間上也擴及到日本殖民的宗教政策促進了新佛教勢力的崛起，是讓傳統儒生在日據時期何以面臨轉型困難之主因，此文堪稱融通中日及臺灣的跨文化儒佛諍辯的典型例子。

最後，談儒佛會通不免要討論到最具典型的王陽明，本次會議有兩篇有關王陽明與禪學的發表論文，即張崑將教授發表的〈達磨與陽明——一個儒佛會通的特例〉及林永勝教授所發表的〈反工夫的工夫論——以禪宗與陽明學為中心〉，前文以戰前日本曹洞宗知名學者忽滑谷快天所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達磨與陽明》一書，連結「陽明學」與「達磨禪」兩項具有儒佛會通的性質，藉由探索此部作品出現的時代背景及其意義，窺出近代日本型態的社會實踐哲學之特色；林永勝之論文則從「反工夫的工夫論」思維，區別出一般所認為「追求光景」的下手工夫，從而進一步探索陽明的究竟工夫，實與禪宗的工夫思維接近，也煥發出新意且具有相當實踐的方式，有別於道教內丹派只停留於工夫論，始終沒有出現所謂的「反工夫的工夫論」。以上兩文，實皆可再將其論述延伸到東亞思想的場域，進一步融通並開發陽明學與禪學在東亞的共同課題與新意。復次，本次會議比較遺憾的是，對儒佛的當代實踐課題之論文，只有胡健財教授發表的〈佛教文化事業與儒家思想——聖嚴法師「心六倫運動」之當代實踐〉一文，此文雖屬唯一與當代實踐課題相關，但該文讓與會學者了解到臺灣佛教團體正積極努力在文化事業之推動，並有承擔起文化事業的宏願，這在東亞國家中是個相當特殊的現象，也讓外國學者也能了解臺灣佛教團體不只從事慈善事業，也有積極地開拓文化事業的面向。

以上是簡述二十篇論文可以進一步開發與整合的課題。本次會議進行之際，精彩討論之處實在於論文的評論與討論的時間，激盪出許多東亞儒佛會通與諍辯的交流議題，頗能讓與會學者感受到東亞的這兩大精神文明正在進行跨學科、跨語言、跨文化的溝通與對話，為二十一世紀儒佛會通的學術研究與實踐性譜出一段美好的前奏曲。筆者忝為會議的執行者之一，從籌劃之初到會議結束，全程參與，學習甚多，深感儒佛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必然要「會通」也必然要「諍辯」，而「諍辯」常被人誤會成為直接視對方為「邪教」、「異端」。其實，所謂「諍辯」未必只是「排斥」，實則「諍」者，有「以直言糾正、規勸」之意，是一種站在理性態度上的「諍辯」，尚須對方可以清醒、改變之意，故有不放棄與對方持續對話的可能。因此，不論我們的生命型態選擇的是儒家或佛家，都必須與當地優良精神文明互相溝通與對話，而不是互相對抗。儒佛關係在歷史上誠然有「排異端」、「批佛」、「罵佛」等現象，但儒學走過二十世紀大半期的儒門淡薄時光，已經徹底不再依附於政權而道地成為「民間儒學」，許多童蒙的儒家經典教育都是靠佛教團體在推廣與承擔，而佛教團體也在世俗上需要儒學的協助，因為儒家倫理在東亞國家的民間社會中，仍然在人倫日用間持續發酵，兩者在「正人心」的共同基礎上，「合則兩利，離則兩傷」。這次會議希望是儒佛會通與諍辯課題的「投石問路」之行，如前所說，怕的是學者不「跨」，只要「跨」出了第一步，相信大家交集的部分會愈來愈多。當然，這樣的會議也不是一次就能有鮮明的成果，所以，我們也正積極在籌劃第二屆的儒佛會通與諍辯之會議，使議題更為聚焦，時代更為接近，希冀為二十一世紀東亞文化中關鍵的儒佛課題，打通彼此「共」與「不共」之良性交流與對話。